

文艺创作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刘润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领域气象一新，涌现出以电影《血战湘江》、电视剧《海棠依旧》《换了人间》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作品，社会主义文艺展现出更加辉煌的前景。

然而，历史虚无主义绝不会因为失败而退场，它总是要寻找各种机会顽强地表现自己。有的以轻薄态度恶搞红色经典，以娱乐化方式消解革命历史庄严内容，有的以所谓普世视角观照中国人民救亡图强的心路历程，有的以凭空杜撰的人物和情节否定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习近平同志曾经深刻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种客观的社会效果，是不以创作者主观动机为转移的。在文艺领域深入持久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既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必然要求，也是爱护广大文艺家的应有之义。

从思想上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依据和政治实质

历史虚无主义在文艺领域的泛滥，有其深刻的历史哲学根源和国际政治根源。

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谷，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也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种狂潮。其中对我国影响最大的，当推英国的卡尔·波普尔和美国的海登·怀特。

波普尔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论断，都强调了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根本错误的。举凡历史的确定性、社会发展规律等等，都是子虚乌有的东西。由此波普尔断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并非不可避免，资本主义初期的残酷剥削现象已经成为历史。此后人类的历史任务不是革命，而是不断改良和发展民主。一方面鼓吹历史的不可知论，一方面又预言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一方面反对历史的任何确定性，一方面又确定资本主义制度永世长存。仅此自相矛盾之处，就足以看出这个貌似现代学说的反科学本质，看出这一学说为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张目的实用主义本质。值得注意的是，波普尔的历史唯心主义与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一样，直到20世纪80年代柏林墙倒塌以后，才成为西方向第三世界极力兜售的“显学”。其命运在特定历史节点上的浮沉，足以证明它是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战的武器。

海登·怀特是后现代主义史学观的开创者。应当说，怀特的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对于纠正现代主义实证史学的机械性具有一定作用，但是由于他对历史学家的主观能动性作了完全脱离客观的抽象夸张，最终沦为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以物质生产为核心和基础的实践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正是因为有了实践，才有了人的发展、有了历史、有了语言，有了历史、现在与未来的联系，有了人的意识、

习近平同志指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

语言和客观世界的联系。实践赋予人类、历史和语言的统一性。然而，在怀特看来，历史却是一个杂乱、无序、矛盾、混沌的领域，没有任何统一性或普遍联系，是写作者的主观意识（思维方式、政治立场、伦理观念、审美倾向等）和特定解释（情节化解释、论证式解释、意识形态涵蕴式解释）赋予历史以联系、生命和意义。写作者的这一切主观因素，可以归结为语言，而且历史叙述也必须以语言的形式出现，所以在历史写作中，处于中心地位的不是历史，而是语言。这样一来，历史叙述也就没有真假、优劣的区别，而成为人们可以随意玩耍的语言游戏。

如果说波普尔颠覆人们对唯物史观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那么怀特则为人们随意涂改、编造历史提供了“理论依据”。当然，搞文艺的人不一定去读他们晦涩的专著，也不一定懂他们玄虚的理论，但是通过一些人似懂非懂、似通不通的鼓噪，可以形成一种舆论氛围；唯物史观被波普尔推翻啦，以往的历史结论不对啦，文艺可以随便书写历史啦。如此等等，无疑是历史虚无主义打开了所罗门的瓶子。

历史是什么？它是一个民族得以凝聚的纽带，得以寄托心灵的港湾，得以自立的一切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母体，得以开创未来的智慧和勇气的不竭源泉。它是全体人民不断探索、思考、实践的产物，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经认真研读和用心思考，轻信他人抱有强烈主观意图的所谓学说，从而轻易否定自己民族的历史，是极其不明智的。如果说唯心主义史学观的渗透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形成来自后方的推力，那么国际资本的诱惑则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激励机制，形成来自前方的拉力。这样一推一拉，倘若正能量又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挥，那历史虚无主义能不闹得欢吗？

从创作上捍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

事实毋庸置疑地表明，保卫中国历史，尤其是保卫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是坚持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因而也应当成为每一位人民文艺家自觉承担的艺术使命。

为此，必须坚持反对历史唯心主义与反对历史机械决定论的统一。在历史领域，机械决定论不承认偶然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把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看作一条直线，把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当作按图索骥式的演绎推导；在文艺领域，机械决定论把文艺作品看作意识形态的简单传声筒，把复杂的极具精神个体的艺术创造等同于流水线式生产。这些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文艺创作规律的错误倾向，又往往以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名义大行其道，因而让后者形象受到极大玷污和损害。其结果是让唯心主义抓住把柄，钻了空子，从而给予历史又一种更加深广的破坏。事实就是这样，机械决定论看上去好像是和唯心主义对立的东 西，其实他们是兄弟，总是要一前一后跑到前台来表现自己。只有把清理历史机械决定论和清理历史唯心主义的工作进行到底，才能厘清它们相互依赖的“依据”，让其难以招摇过市。

为此，必须坚持自由与责任的统一。在我国，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社会思想文化日趋多元多变多样，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现，这是不能回避的现实。社会的思想自由和创作自由既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所决定，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内在要求。但是，自由不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是脚踏实地的社会实践。既然是社会实践，就必然离不开群体和社会，既然离不开群体和社会，就必然要对群体和社会承担责任或义务，而不能想怎样就怎样。自我放纵不是自由，而是无政府主义的独断专行。恶搞历史、抹黑历史绝不是创作，而是对民族尊严、国家利益的肆意伤害，对思想自由、创作自由的粗暴践踏。这好比踢足球，无视比赛规则，抱起足球横冲直撞，哪里还有大家踢球 的自由？又好比过日子，吃着自家的饭又砸着自家的锅，哪里还有全家人吃饭的自由？文艺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无论怎样强调个人思想自由，也不能逾越爱国主义底线；无论怎样翻转腾挪，也不能伤害国家民族的利益。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没有绝对 的自由。即使是在某些人视为自由天堂的美国，也绝不允

许抹黑美国独立的历史、污辱华盛顿或林肯这样的领袖人物。数年前，恶搞林肯的电影《亚伯拉罕·林肯：吸血鬼猎人》刚一出笼，即遭到美国民众的集体“拍砖”。

为此，必须坚持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统一。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文艺创作，都是复杂的精神劳动。没有主观能动性，不可能产生任何成果。那些最严谨的史学著作，留下了作者深刻的精神印记。对于以虚构见长的文艺创作来说，更是如此。不过，问题还有另一面，即主体性不能离开客体性依托，主观意识不能背离历史真实。只有站稳尊重历史立场，才能实现主客融合，从而使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正面激发和表现。恰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只有立足大地才有无穷力量一样。那些抹黑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史的文艺创作，由于其创作意图处处与历史真实抵触、与自己生活经验抵触，创作起来只好求助于生编硬造，于是文思不畅、笔下滞涩也就势所必然。君不见那些作品除了概念化的政治宣泄，就是对后现代主义跟风模仿，哪里有什么戛戛独造、生气灌注的东西呢？

对于历史题材创作来说，所谓坚持客体性，并不是要求文艺家像历史学家那样去追求历史事件及其细节真实，而是要求必须尊重历史本质的真实。也就是说，即使你在某些历史事件及其细节上达到相当程度的真实，但是对历史本质却作了扭曲的描写和评价，也不能说是尊重历史客体性的创作；即使你对某些历史的描写，其事件、情节完全是虚构的，但是正确反映了那一时代的本质方面，也可以说是尊重历史客体性的创作。

可以说，历史题材创作好比一条线段：一极是历史真实，一极是艺术虚构，这两极之间的广阔地带都是文艺家们的用武之地。你可以往历史真实那边靠近，艺术虚构较少；也可以往艺术虚构那边靠近，历史真实较少。但是无论你选择哪一个点，都不能与两极中的任何一极重合。和历史真实一极重合，就成了历史学著作而非文艺作品；和艺术虚构一极重合，就会因违背历史本质真实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归根结底，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统一就是历史规律与艺术规律的统一。文艺家们要实现这样的统一，自己首先必须实现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文艺观的统一。

（作者为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



年俗是“年文化”的具体载体，我们所以感到年味儿淡薄，不是没有年的情结，而是传统年俗日益消减所致。善待传统年俗，同时积极构建当代年俗系统，让年的灯笼在大年根儿红红地照亮



有人曾对我说：“过年不就是一顿鸡鸭鱼肉的年夜饭吗？现在天天鸡鸭鱼肉，年还用过年吗？”也有人说：“过年就是一个黄金周吧，比平时周末不过多出几天而已。”我听罢便说：“你说黄金周也可以，这可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文化黄金周！”

年，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节日，从腊八到转年正月十五，历时一个多月，都属于“年”的范畴。年文化本质是精神的、理想的，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道德、价值观和审美的传承载体。欢乐、祥和、团聚的节日主题，蕴藏着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为四海华人所认同和共享。不信，去听听大年夜里中国人相互之间越洋跨洲的拜年电话——它决不同于平时的相互问候。中国人的年，可是老百姓主动增加民族凝聚力、亲和力的节日！

因此，对于年，我们只能加强它，不能简化它、淡化它。2006年，春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遗产传承者是艺人，节日遗产传承者是全民。要传承好节日传统，就要遵从文化规律，顺乎民情，合乎年俗内涵。如此，才能使优秀春节文化得到真正继承与弘扬。几年前，春节假期的调整让大多数人得以在除夕夜阖家团圆，这就是对春节文化的遵从与加强。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最重要的当属除夕。这一天是一年之中最后的时光，是最具生命情感的日子，因此一定要和亲人团聚一起；陪伴生养自己的父母过年，有如依偎着自己生命的根与源头；和同一血缘的家人枝叶相拥，尽享亲情。为此，春运才有如此磅礴的力量。由故土、乡缘、乡情汇集而成的巨大磁场，遍布大地山川每个城市和村庄。让这个场产生效力与魅力的，既是感情的力量也是文化的力量。

年文化不是哪一天建立起来的，它是在数千年历史中经过长期创造、选择和积淀而成的，大量、密集民俗如五彩缤纷的节日活动、难以数计的吉祥图案，共同构筑起年的理想主义景象。它既有视觉的（颜色与图像）、听觉的（鞭炮声与拜年声），又有味觉的（应时食品）、嗅觉的（香火和火药），年文化占有我们所有感官直至心灵，并深深留在我们民族记忆里。由此我们懂得，真正的文化不在于用金钱造势，而在于是否融入人的心灵和血液之中。

年俗，正是年文化的具体载体。人为地简化或淡化年俗，是文化上的怠慢与缺失。以除夕来说，除了年夜饭，还有许多传统活动应在这一天进行。中国人的传统是敬畏天地；我们生活的一切受惠于天地，自然心怀无尽感激；天地有自己的规律与特性，不能违反；天地奥秘之于人类，还有很多尚未可知。因而，按照传统习俗，要在除夕这一天恭恭敬敬地拜一拜天地、祖先、亲人、师长，表这度敬天地、善待万物、感恩生活、庄重迎新 的态度。

我们所以感到年味儿淡薄，正是传统年俗日益消减所致，而不是因为年的情结淡漠，后者从大家置办年货的红火，春运大潮的涌动就可以看出。“旧”年俗所以被淡化乃至被摒弃，一是外来文化和流行文化冲击；二是生活方式多样化，很多人不愿再遵循繁缛习俗；三是现代人缺少对年文化的充分了解和认知。于是，种种传统年俗被一样样地从春节中“撤出”，以至春节竟被调侃为“大周末”——缺少年意、缺少年味——恐怕这是当代中国人深深的集体失落！不仅年俗，当一种生活成为过去，它遗留的风俗不再是生活方式，而是文化方式；它不是物质载体而是精神载体。一个民族最纯粹的文化，往往就活生生地保留在风俗中。因而，风俗不但不应被盲目破除，反而要被审慎对待乃至放置保护之列。

与此同时，我们应积极构建当代年俗系统，使我们的年浓郁、美满、充满魅力地传衍下去。这一构建，需从节日生活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不是盲目创新。试想，若将春节鞭炮声换成《蓝色多瑙河》旋律，将圣诞老人换成老寿星或财神爷，人们能否接受？多年前，有记者在天津天后宫年货市场上采访我，问我天津老百姓怎么过年。我顺手从剪纸摊上拿起一个小福字给他看，有多小？只比大拇指指甲大一点儿。记者问：这么小的福字贴在哪？我说贴在电脑上。过年时将这小福字往上一贴，年意顿时来了。这种微型福字过去是没有的，这是源自传统的再创造，也为当代节日生活所需。

团圆、和谐、富足，年是人生中一年一度用尽全力实现出来的生活理想！把生活理想化，把理想生活化，是中国人特有的年文化心理，充分表达人们对生活的热情与希冀。中国人每过一次年，就深化一次民族的亲和力、凝聚力，也就是加强民族的生命力。因此，每逢过年，我都会觉得土地是热的，都会感到民族这个概念变得更实在、更动情。我会习惯地把屋中西洋风味的陈设收一收，将应时的年节物品花红绿绿地摆出来。还会把自己的画也摘下来，换上珍藏的古版杨柳青年画。我想从中重温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体验他们对生活独有的浑挚情感，感受中华大地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朗朗精神。

相信只要我们的传统文化根脉在接续，只要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紧拥不弃，年的灯笼就一定会在大年根儿红红地照亮！

冯骥才，浙江宁波人，1942年生于天津。当代作家，代表作《啊！》《雕花烟斗》《神鞭》《珍珠鸟》《俗世奇人》等，作品有40余种外文译本；当代画家，被誉为“现代文人画代表”；当代文化学者，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和传统村落保护倡导者、践行者。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专家委员会主任等职。



艺海观澜

既要“返乡书写”，又要“书写返乡”，这是时代课题，同时意味着书写是带着泥土芬芳的邀约，呼唤有识之士在乡建实践中写作，在写作中推动实践

近年来，返乡书写逢年而兴，社会关注度逐年提升。从博士生返乡笔记到农村儿媳眼中乡村图景，类似主题的文章在新媒体时代得到广泛传播和不小的回响，各种争论随之而至，也催生出越来越多类似角度的书写。

乡愁乡思是人类的朴素情感，古已有之；表现乡愁乡思的文学经典，也在历史上层出不穷。但是，以城市生活为立足点反观乡村的个人书写，则是当前城乡社会快速变迁的新产物。这种乡愁是复杂的，既包括立足城市回望来处的惆怅，也包括面对乡村诸多待解问题的焦灼，更包括对乡村美好未来的关切与期盼。今天的返乡书写不再仅仅是对故乡想象性的描述、回忆滤镜下的美化，还是书写者复杂情感的逐层表达，是这个时代挑战与机遇并存、充满

从“返乡书写”到“书写返乡”

潘家恩

物物生机的微小缩影。

这种书写出自写作者最真切的生活体验，因而具有大地般蓬勃的生命力与生命本身的多样性。遗憾的是，今天的“返乡书写”正在模式化、套路化，有真情写作，更有充斥低俗噱头、以“返乡”为名的自我炒作，还有对城乡关系的刻意扭曲，等等。原本朴素的乡愁乡思被廉价化商品化，本应加以理性思考的现实处境被情绪化地疏泄，具体写作也缺少严肃文学的追求与品质，因而被批评者揶揄为“返乡体”。另一方面，“返乡书写”被戏谑、调侃，随之伴生出“反返乡体”，让这一新兴写作尚未得到全面发育，即有萎缩之虞，一些批评者一叶障目，过于急切或武断地将返乡书写归纳为“苦情剧”，窄化批评对象本有的丰富性，从而引发“反返乡体”的网络潮流，不利于返乡书写丰富内涵的发展与展开。

如何真正让这一新兴主题的文学写作得以健康蓬勃地发展？从创作主体角度来说，严肃写作应该是真诚且有建设性的。为彰显所谓存在感，以城市中心主义的“精英”身份冷眼看待自己的来处，以刻意贩卖

现实中的“假恶丑”满足网络时代的窥探欲与猎奇心，首先是对自我的降格与辱没。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恶意曝短与“爱之深责之切”的中肯批评，二者有天壤之别。我们需要的是建设性的批评，是以自尊自爱为底色的现实观照与现实书写。

从批评者角度来说，也应秉持中正、职业的视角，避免二元对立思维下的武断批评，不仅要 对恶俗之作勇于亮剑，也要对鱼龙混杂中难得的优秀作品，给予及时肯定和彰显，进而帮助写作者拓展返乡书写的张力与内涵，共同让这一具有时代特色的新书写丰富当代文学面貌。

此外，我们还需注意到，大多数农村务返乡写作者和众多躬身耕耘的城市返乡实践者，在“返乡体”“反返乡体”的网络喧嚣中反而沉默。推动这一群体主动表达与分享，让这一群体被更多人看见，将推动乡土与都市的精神对话向纵深发展，转而成为直接推动建设性实践的能动力量。

当前，具有这一自觉意识并积极作为的推动者日渐增多。一些高等院校与民间乡建机构优势互补，努力将更为广大的

“在乡者”和“返乡实践者”纳入研究视野，加深对“乡土”意义与价值的理解，凸显乡村建设性力量与无尽潜力；同时鼓励这一群体从“返乡书写”转向“书写返乡”，通过写作，在研究者和实践者间搭建桥梁，促进城乡资源有效对接，推动各界人士积极参与乡村建设，释放乡村活力与魅力，在这一过程中又自然反哺文学创作本身，形成良性循环。从“返乡书写”到“书写返乡”，这同时意味写作不再是自娱自乐的“抽屛写作”，而是“互联网+”时代中带着泥土芬芳的邀约，呼唤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在乡建实践中写作，在写作中推动实践。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刚刚发布。乡村是热土，等待我们去重新认识和开发；乡建是此时与未来重大社会课题之一，有待更多“在乡者”和“返乡者”去书写。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返乡书写”亟待发展为“书写返乡”，这关乎一个时代史诗的记录，也关乎每一个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